

焦点透视

学人关注

编者按

近日,湖北省妇联召开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推进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深入开展”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围绕《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的学习、宣传和贯彻,与会者分别从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家庭文明创建等不同角度进行交流发言,共商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工作的方法、路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为集思广益,共同探寻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工作的好思路好办法,4月28日,湖北省妇联召开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推进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深入开展”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围绕《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来自湖北省妇联、教育厅、文明办、直属机关工委、人大常委会社建委的相关同志,来自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来自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和各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荆楚最美家庭代表和基层妇联干部,分别从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家庭文明创建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交流发言,共商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工作的方法、路径。

进一步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全社会都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萧永瑞表示,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重视与忽视对孩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基础教育中,家校携手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拥有健康家庭教育的孩子,在学校素质教育推动下,在学习上逆转胜出的机率远大于其他的孩子。学校以培养合格的人为目标,要适应新时代德育工作的要求,为家长、学生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积极组织开展家教、家风传承互动,力求实现家风、家教与校风、教风、学风相融合,从而有效提升德育效果,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功能、家风影响、家教作用,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都有系统论述。而这些论述,都贯穿了“家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成长与发展、幸福与梦想的主线。国是千万家,有“人”才是家。家的本质,不是房子空间、财富物品,而是人的共同存在、人的互动关系、人的共同活动、人的共同幸福。人是家庭一员,也是社会成员,是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力量,家庭则是培养人、教育人、实现人的社会最小单元,重视“家”,是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人的美好价值取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体现的是党和国家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视,彰显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党员干部的家庭家教家风,与党风政风息息相关。湖北省委党校李银安教授认为,做实党员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组织和各单位应加强对党员干部履行正常家庭责任义务的关注和考察,督促领导干部遵守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切实做到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也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自觉对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要求与规定,自觉将履行家庭责任义务、家风建设与党性修养建设联系起来,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过好亲情关、人情关、廉洁关,学先贤齐家之法,思家风败坏之害,践君子正人之行,悟清廉治家之道,自觉做合格党员、合格干部和优秀家庭成员,为正党风、促政风、带社风、淳民风做示范当表率。

协调联动做好“家”字文章

家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与千万家庭的共同努力。

今年5月1日,《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万方认为,《条例》的制定,是湖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重要要求的有力举措,是落实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有效路径,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家庭教育工作短板问题的基础保障。全省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好家庭家教家风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增进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

湖北省委宣传部文明创建三处调研员莫伟表示,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系列重要论述,下一步,湖北省文明办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湖北省文明家庭创建管理办法》等文明家庭激励与管理细则,促进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常态化长效化;二是坚持价值引领,组织“好家风好家训”展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主题教育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三是传承红色家风,组织“诵读红色家书 传承红色基因”短视频征集活动,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四是倡导文明新风,组织城乡居民谈家风、议家规,晒幸福照片、讲和美故事,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孝子女”等家庭角色推选活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五是做好典型宣传,加大和创新对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宣传力度,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做好家庭工作,以小家庭的和谐共建大社会的和谐,是党中央交给妇联组织的重要任务,也是妇联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重要着力点。妇联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到工作中。

湖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述永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注重发挥家庭的基石作用,是推进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根本遵循。妇联组织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提高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内生逻辑,把握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方向原则,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广泛深入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李述永表示,在深学细悟《论述摘编》过程中,全省妇联组织要进一步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在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好风气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强化妇联组织对广大妇女的思想引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落地生根,使家庭文明创建接地气、家庭指导更精准、家庭服务更加精准。要坚持开展家庭文明创建活动,重点推进寻找“荆楚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创建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做深做实“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活动,开展“绿色家庭”“最美庭院”创建工作,以《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和队伍建设,推动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完善支持家庭发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助力广大家庭提高生活品质,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家庭在社区和邻里和睦、美丽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面积极参与、发挥作用,鼓励家庭成员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与义务,积极参与基层自治,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使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阅读提示

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本文作者考察了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塑,认为在潜藏“男性凝视”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受难的身体往往被塑造成民族伤痛的符号,并隐含着女性是男性占有物的意味;战争题材电影中,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男性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雄符号,女性则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这遮蔽了战时女性的独立价值。



《金陵十三钗》剧照



■ 罗小媛

由国民之血泪绘于历史版图的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笔者从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电影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塑切入,深入挖掘战争题材电影性别叙事背后的隐性价值观。《风声》《金陵十三钗》《那些女人》等电影在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女性贞操的介怀、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等方面不同程度体现出“男性凝视”下的同态性,影响着女性话语与价值的表达。《明月几时有》则以真实历史为蓝本并嵌入电影创作者的女性意识,为两性角色塑造和人物情感的刻画探索出一条更为悠长的路。

受难的身体: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价值

受传统性别权力观念影响,在潜藏“男性凝视”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价值通常被切割成身体和情感,女性受难的身体也被塑造成民族伤痛的符号,并隐含着女性是男性占有物的意味。在对女性身体苦难过度书写的背后,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多样性价值被禁锢,成为男性欲望眼光与想象下的消费品及性别权力法则的衍生物。

在《风声》中,酷刑成为女性遭受身体劫难的重要呈现方式。电影以“香料、恶犬与女人”镜头开篇,结尾又对暴露身份的顾晓梦施行刑,赤裸地融合女性的身体、性与暴力。在封闭的空间内,武田作为男性权力掌握者,借用李守玉的情爱对象刘林素为要挟,以冰冷的器械对待恃孤高的她进行身体“度量”,在血腥以外,联结的是女性的身体、贞操与屈辱,实现精神上的摧残。影片赋予李守玉的光鲜“人设”,在“男性凝视”的话语场域显得不堪一击。

在《金陵十三钗》中,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关于前者,日军对豆蔻、香兰的性虐:被尖刀刺破的香兰,裸露着死亡的凌辱;跳河未遂的豆蔻被绑在木椅上承受轮流的暴行。关于后者,覆盖于整部电影与贞操相关的价值隐喻,将女性身体变为男性的私有、欲望的载体、苦难的符号。电影有意将欧式教堂里的女性塑造为令人垂涎的“财宝”,“贞操”区分着女学生与歌女,日寇对女学生“纯洁”身体的觊觎推动剧情发展,男性想象建构中歌女以大义保护男性凝视下女学生的“贞洁”,在灾难叙事中注入“性”的成分,从另一个侧面构成对女性价值的盘剥。

自我的意志:国族感召下的女性主体

父系社会话语体系下,两性平等除须经济政治上实现女性赋权,更要完成女性的内在启蒙。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

《明月几时有》塑造了一系列身份各异的女性小人物,她们在战争中拥有不同的遭遇与使命。知识女性方兰是瘦弱的小学教师,她拒绝男友求婚,自愿加入地下工作。平民阿四是无数贫苦女性的代表,影片侧重点并不在于挖掘其“身体的苦难”,而是着力展现战时女学生的朴素价值。富家小姐张咏贤为父报仇潜伏敌营,影片并未过度凸显复仇心理,表现的是她出色的情报能力。方母是集合母亲、妻子、

战火悲歌:抗战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叙事



市井小民、爱国志士于一身的角色,起初胆小怕事爱唠叨,却直接拒绝投奔丈夫而打破“妻子”身份,在母爱的拉扯下接受女儿投身抗战,耳濡目染后甚至协助女儿运送物资,意外被捕时仍坚持“不要连累队友”,“母亲”形象的建构于方母而言,并未构成主体性的桎梏。这种着眼于小人物人格的塑造,促使女性在战争中不以身体和身份性别身份体现价值,成功地将女性主体性身份和战争贡献嵌入革命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

《那些女人》同样发掘女性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坐标,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却仍有舒展空间。水芹娘是战争受害者的叠加缩影,她投身革命的动机主要基于自身蒙受的苦难,并非纯粹由于民族大义驱使。惠姑娘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几度挺身而出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善良的内心、性别权力话语规训下对贞操的重视、赢得尊重的渴望。除此,不齿于“翻译官”丈夫的行径而主动帮助新四军的小玉,声称“脚一样,走的路不一样”后悬梁自尽的保老太太,这些女性无不在国难的感召下定了各自的角色,但依然没有脱离旧式伦理道德的规训。

《金陵十三钗》围绕十四位风尘女子与女学生的故事展开,剧情的主线几乎离不开女性“身体”贞操。两性形象的建构分属“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两大群体:除了军人,外国人的摄影师和年轻的男孩皆有力量保护女学生和歌女,书娟的“汉奸父亲”也能够与日寇虚与委蛇,唯独各类女性角色充当着待宰的羔羊。电影反复强化女性身体的脆弱,以及多情而缺乏笃定的性情。电影的“上帝之手”在每个女性角色心里埋下“贞洁”的种子,默认身体可以充作战争交换的价值对象,完全卷入作为“男性凝视”被赋予的身体情感功能。她们成为剧情的“主体”,却从未在自我生命中建立“主体地位”。

性别的藩篱:英雄建构与非典型男性

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男性一方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雄符号,女性不免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扮演着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对象,这种在战争中客体角色的形塑,无疑是对战时女性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此同时,受传统男性英雄主义世俗话语的影响,男性英雄角色也往往被描绘成勇武善斗的模样,这在潜移默化中也限制着男性力量与男性价值的多样性表达。由此,文艺创作者亟待与时俱进,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多维度、多视角地讲好战时英雄的生命故事。

在《风声》中,玲珑果敢的中共地下党员顾晓梦在裘庄想尽办法,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传递情报,但最终“情报是假、切勿行动”的关键信息仍是通过另一位男性英雄吴志国的《空城计》传出。在《金陵十三钗》中,最后直接带领女学生逃离南京城的还是约翰“神父”。相较而言,《明月几时有》《那些女人》则分别展现了香港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纵队的历史风貌,以及濠河上新四军团结民众的火烧竹筒笆的正面战斗,无不切中了女性在战争与革命中主体能动性的一个,剥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叙事与历史书写。

除此,在《明月几时有》中,男主角李锦荣温文尔雅、言语和柔的文人形象,与双腿受伤仍站立赴死的浩气凛然之间并不冲突,男性刚烈气质的软化也显现出别样温和的力量。打破传统性别藩篱的男性英雄角色丰富了多元化的男性气质,是对男性刻板印象的某种超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建构赋予男性的性别焦虑。与此同时,两性气质的开放性也有利于女性发展空间的宽广化。“阳刚之气”既可以突破男性专属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色,“侠骨柔情”也理所当然构成两性共享的权利。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研究视窗

《中国城市女性的抚育实践与二孩生育决策》

作者:聂焱 风笑天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以来,目标家庭是否积极响应政策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特定反应。本文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访谈资料,探讨这些家庭中女性的抚育实践及其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抚育实践表面上遵循“谁有空谁做”的协作原则,实际上却隐藏着性别差异:女性花费更多的重要时间,面临更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尽管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女性普遍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却又表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的独立而不是背离家庭的独立。这种独立形塑了她们之二孩生育决策:当压力在主观上被认为抑制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她们就会放弃自己想要生育二孩的意愿。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5期

《性别、自我与媒介: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女性教育》

作者:吴菲

女性教育既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背景,从性别、自我与媒介层面考量女性教育,在剖析教育消费与家庭背景的显性关联、母职文化与自我成长的隐性矛盾、媒介呈现与形象构建的传播倾向、媒介生态与舆论生成的作用机制后,认为这几对关系凸显了女性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通过开发在线优质资源、拓宽教育渠道,创设良好社会氛围、加强人文关怀,开展女性媒介素养教育、引导舆论走向,提升女性理性自觉、维护教育权利等,保障女性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切实增加女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及性别角色重构》

作者:张轶 潘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与思想意识的变革,使得女性权利在经济、政治、受教育水平及婚姻家庭状况等方面发生改变。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业状况从结构单一到领域多元;政策倾斜从保障生存到保障发展;受教育程度从学历较低到层次提升;婚姻获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中国性别角色从“男主外女主内”到“男女共同承担”发生了质的变化,折射出人们思想由“歧视女性”向“男女平等”转变,以及中国女性从“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发展。扫清认知障碍,借助两性发展动力优势,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女性优势、尊重两性社会差异与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平等才是性别角色重构的发展核心。

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素波 整理)